■宁夏英烈故事■

李有祯：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

李有祯画像。

李有祯，又名李清惠、李福明，1923年出生于宁夏城（今宁夏银川市），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8月，新安旅行团（原名“新安少年长途修学旅行团”）由北平经绥远到达宁夏地区，他们沿途每到一个城镇，都在公共场所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如向群众演讲、唱抗日歌、演抗日戏，放映“一二·八”淞沪抗战影片，播映日军暴行的幻灯片等，大大激发了宁夏地区各学校学生的抗日积极性。新安旅行团在宁夏城时，宁夏实验小学教导主任杨文海（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薛云亭（共产党员）等，带领该校学生，配合新安旅行团的宣传活动，组织座谈，学习他们的经验。在校长贺自正、高立天的支持下，杨文海、薛云亭、涂冲林在宁夏实验小学以高年级学生为主，秘密成立了“西北少年抗日战地服务团”（以下简称“少战团”）。

李有祯当时在实验小学读书。由于母亲去世得早，生活十分艰难，他面黄肌瘦，沉默寡言。但他学习很用功，富有革命思想和热情，很早就加入了少战团，并任少战团工作推进股股长。

少战团的活动由秘密状态转入公开状态后，李有祯已从实验小学毕业考入宁夏中学，但他不忘曾经教育过他的母校，继续关心和参与实验小学少战团的活动。1938年7月，高立天、薛云亭领导的宣传队到达平罗、黄渠桥等地宣传，李有祯任宣传小队长。宣传队到达平罗时，正赶上庙会，团员们便在戏台对面摆摊场，利用演讲和演出话剧宣传抗日。群众簇拥在团员周围听演讲、看话剧，有的甚至被感动得流下眼泪。当时的《宁夏民国日报》曾作过如下报道：“省垣暑期宣传队，实小宣传队由小队长李有祯率领到市讲演。讲题大意为：日本欺负我们已忍无可忍……为着我们的国家民族，前方的将士已牺牲了许多，我们后方应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责任。当时听众围满街头，颇为感动”。

1938年10月的一天，少战团刚从贺兰金贵回到实验小学，国民党宁夏省军警联合督察处就来抓人。杨文海当时化名侯亦人，亦叫侯振斋。荷枪实弹的敌人气势汹汹地走进校门，恰巧碰上了他，便问道：“你们学校有个叫侯振齐（敌人不认识“斋”字，误认为“齐”）的吗？”杨文海一听敌人根本不认识他，就随机应变道：“有。”随即往后一指：“在那边。”借机支走敌人，在校长高立天的掩护下，杨文海机警地从学校后门逃走。杨文海临走前，将一部分材料交给李有祯转移。李有祯把材料带回家隐藏起来，但对学校的情况又不放心，晚上，他从学校后门进来，被便衣警察挡住，他们逼问道：“你来干什么？”李有祯机敏地说：“我是这个学校半工半读的学生，别人不在，让我和伙夫老刘照看一下。”便衣警察再三盘问，他总是重复那几句话。那帮家伙见问不出什么名堂，便把他关在一个黑暗冰冷的屋子里。李有祯看到那些人打着手电筒搜这搜那，就喊着要小便，以此来干扰他们的视线。1938年冬，由于李有祯思想进步、工作积极、成绩突出，由杨文海和薛云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敌人逮捕杨文海未遂，便逐个对同杨文海有来往的人进行传讯审问，使全城处于恐怖之中。此时，少战团由于得不到党的指示而停止活动。1939年元旦，李有祯和少战团副团长李志纯在薛云亭的带领下来到陕甘宁边区，被分到边区中学就读。李有祯改名李清惠。

1940年初，李有祯被派到边区保安处办的训练班学习，结业后，分配到三边保安处工作。到定边后，他先和何述田等人在定边东门外开了个骡马店，后又和冯益民、刘保元开了个杂货店，以此作掩护开展地下工作。

1941年，按照上级指示，李有祯被派到安边国民党十一旅做党的地下交通工作。他经常挑着扁担，以小商贩身份，从安边到靖边与中共地下党员李启明和余光进行联系，同时与直接打入中统的李生儒进行联络，传递情报。李有祯对党忠诚，工作认真负责，吃苦耐劳，给李启明和余光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并对他给予高度评价。

1943年，李有祯被派回宁夏做党的地下工作，组织上给他改名李福明。李有祯的父亲李福泽在国民党银川市警察局工作。为了开展工作，他以开磨坊为掩护，从事地下交通工作，经常挑着货郎担到贺兰丰登、旧满城等地开展情报搜集工作。

1947年3月，马鸿逵进攻三边，由于叛徒出卖，将李有祯供了出来。马鸿逵部一二八军立即向主子发电邀功，伪银川警察局获悉后将局内所有姓李的逐个审讯，李有祯身份暴露，遭敌人逮捕。在监狱中，敌人对李有祯进行严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敌人未能从他口中得到任何信息。

1947年9月16日，塞上古城银川阴风怒号，杀气腾腾。李有祯和另一位中共地下党员李志勤被国民党宁夏军法处的宪兵押赴银川东教场枪杀。在刑场上，李有祯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面对敌人的枪口，怒目而视，牺牲时年仅24岁。

（据宁夏党史教育）

野湖井村——黄土塬上的传统村落

野湖井古城遗址。

在盐池县王乐井乡的黄土塬上，坐落着一座承载千年历史文脉的古村落——野湖井村。该村2026年3月被列入自治区第三批传统村落名单。

野湖井村的村名演变有着明确的历史脉络。古时，此地荒僻偏远、狐兔出没，得名“野狐岭”。后因村东一口水井常年喷涌清泉，滋养世代先民，村民遂将村名更改为“野湖井”，沿用至今，成为村落鲜明的历史标识。这里留存着两处宋代古城遗址，两城相距不足千米，均为宋夏时期边陲军事防御遗存。

村西南侧西水沟对岸的野湖井城，当地俗称“狄青古城”，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该城始建于宋代，采用本地黄土夯筑而成，平面呈正方形，周长近千米，虽经千年风雨侵蚀，其主体格局仍保存完整，尽显当年军事要塞的雄伟气势。城墙最高处达8米，基宽9米，东墙设门，宽6.6米，四角留存防御角台遗迹。受洪水冲刷与风沙侵蚀，城墙东北角形成明显缺口，墙内积有流沙，东墙基外侧可见风蚀凹槽，均为岁月侵蚀的真实印记。每逢雨季，城周季节性流水汇于城东北，形成小型水域，兼具防御与灌溉辅助功能。

自狄青古城向东北500米处，为马千湖古城，当地俗称“双羊古城”。该城坐落于山梁之上，规模虽小于野湖井城，但军事地位同样重要。古城东西长90米、南北宽80米，南门为主要出入口，城内北墙正中矗立一座明代烽火台。该烽火台与村内野狐井烽火台遥相呼应，共同构成明代边境地区完整的边防预警体系，民间称其为“八墩子”，成为研究古代军事的实物佐证。

野湖井村的先民迁徙历史可追溯至明代。元末明初，战乱导致多地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明太祖朱元璋推行移民政策，野湖井村最早先民由山西迁徙至此。

除古城与烽火台外，野湖井村还留存两处重要历史环境要素，承载着村落的发展记忆。一为西水沟，形成于明代万历年间，是当地唯一的地表沟泉常流水，两条溪流分别发源于村落西南与东北，向北径流，春季冰雪消融后水量充沛，水质清甜，兼具人畜饮水、农田灌溉与泄洪防涝功能，是村落生存发展的重要保障。二为村内20余株百年榆树，多为1925年前后村民栽种，目前长势良好，部分树干胸径达50至80厘米。在物资匮乏时期，榆叶、榆钱曾作为村民的补充食物，如今这些古树不仅具有防风固沙的生态作用，更是村落历史的“活化石”，承载着村民的集体记忆。

野湖井村文化底蕴深厚，境内孕育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野狐岭的传说》。该传说以盐池方言为载体，流传至今已有900余年，讲述了宋代大将狄青与西夏双羊公主在野狐岭交锋、和解，最终促成宋夏边境休战的历史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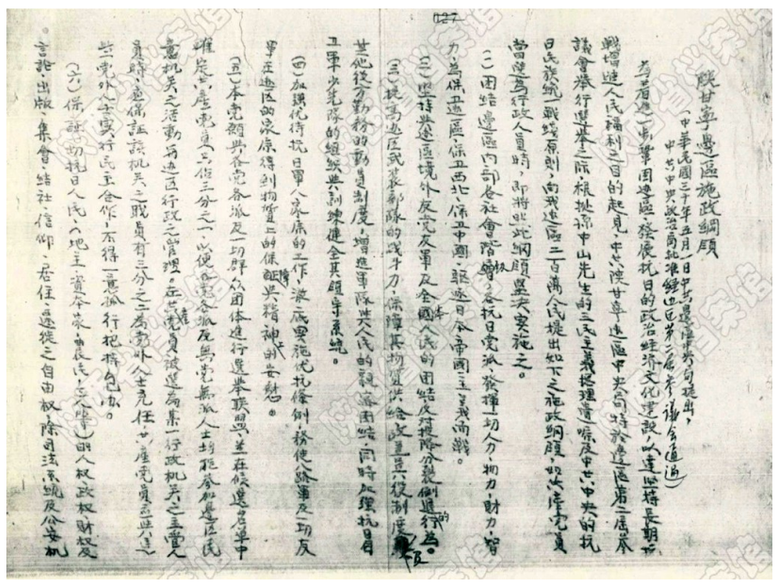
岁月流转，文脉绵延。如今的野湖井村，古城遗迹保存完好，百年古树枝繁叶茂，民俗文化传承有序，村民在这片承载千年历史的土地上辛勤耕耘、繁衍生息，实现了古老历史文脉与现代乡村生活的有机融合。

（据盐池党史和地方志研究）

为了增加老百姓幸福（上）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的政绩观

1941年5月1日，正值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举行选举前夕，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向边区200万人民提出《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共21条规定，并宣告如共产党员当选为行政人员，即将照此纲领坚决实施。此时正值国内外形势发生激烈变化，国民党施行黑暗统治，全国人民彷徨无主。而毛泽东对边区寄予厚望：“边区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他把边区作为一切工作的试验区，要求为全国人民做出一个榜样。这份由毛泽东改写定稿的纲领，现藏于陕西省档案馆。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命的生动体现，更深刻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成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光辉典范。



陕甘宁邊區施政綱領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一日中共邊區黨代表會通過，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經四屆參議會通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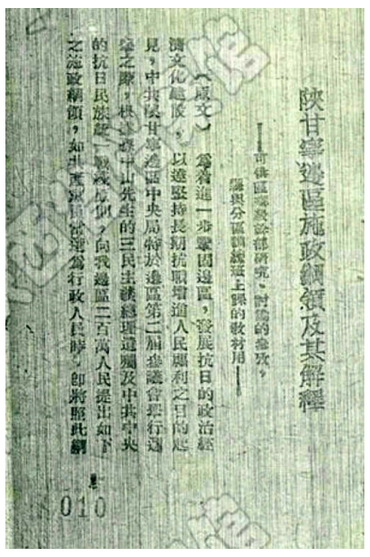
為增進人民福利之目的起見，中共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舉行選舉之際，根據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建設邊區，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原則，向我邊區二百萬人民提出如下之施政綱領，望大家完全實施之。

（一）團結邊區內部各社會階級及各抗日黨派，發揮一切人力、物力、財力，為保衛邊區西北、保衛中國，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而戰。

（二）堅持共產黨領導外，反完全將共產黨及全國人民的團結及權益分裂倒退行為，其他從力動搖抗日軍隊共產黨的謠言，同時加強抗日軍中共先鋒的組織共同建設共同領導系統。

（四）加強代行抗日軍人家屬的工作，發展實施代耕條例，務使從事抗日工作之人家屬不致因生活困難而影響抗日工作。

（五）本黨願與各黨各派及一切群眾團體進行選舉聯盟，並在候選名單中確定共產黨員只占三分之一，政府系統人員大幅減少，加之開展大生產運動、厉行节约运动等，人民的负担迅速减少，民力也得到大幅节省。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及其解释

——可供区域政治部研究、討論的參考，

編與分區幹部總法上課的教材用——

（原文）為增進一步鞏固邊區，發展抗日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以達堅持長期抗戰增進人民福利之目的起見，中共陝甘寧邊區中央局特於邊區第二屆參議會舉行選舉之際，根據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建設邊區，中共中央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原則，向我邊區二百萬人民提出如下之施政綱領，望大家完全實行政人員時，即將照此綱領

010

1941年5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颁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陕西省档案馆藏）

1941年6月30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宣传部印发《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及其解释》（陕西省档案馆藏）

以增加老百姓幸福为目的

纲领开宗明义，其颁布的核心目的是“为着进一步巩固边区，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达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之目的”。1941年6月30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宣传部在《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及其解释》中进一步点明，实现这个纲领，就是为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与增加老百姓幸福”。

如何将“增加老百姓幸福”落到实处？必须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其时，边区部分干部对民主的认识还不够，工作上还有一些强迫命令的现象、官僚主义的态度，有些群众还不知道民主的好处，还不知道自己应该出来管理自己的事，对政府有意见不敢讲出来。为此，纲领提出了著名的“三三制”原则，“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并解释：“不管什么工作，比如县长也好，乡长也好，只要能得到群众的拥护，不是党员也是一样可以担任的。”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开幕式中强调：“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它的党员应该站在民众之中，而决不应该站在民众之上。”此次大会上，绥德开明士绅安文钦当选边区参议会副议长，米脂开明士绅李鼎铭当选边区政府副主席。会议期间，李鼎铭等人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精兵简政”提案，并以165票的多数通过实施。此后，边区政府先后开展三次精简，军队的总数缩减至边区人口总数的2%，政权机关裁并了四分之一，政府系统人员大幅减少，加之开展大生产运动、厉行节约运动等，人民的负担迅速减少，民力也得到大幅节省。

在军民关系建设上，纲领同样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军队要遵守群众纪律，不侵犯群众利益（比如借用东西一定要还），要爱护群众（反对打骂群众）……军队没有老百姓的帮助，就很难打胜仗，老百姓没有军队保护，也就不能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从1943年初开始，陕甘宁边区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运动，推动军队积极参加生产、减轻群众负担，主动帮助群众开展春耕秋收，广泛倾听群众意见。这极大巩固了军政军民团结，为保卫边区、建设边区、争取抗战最终胜利筑牢了群众根基。（未完待续）

（据《学习时报》）